

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

■贺龙



大革命失败,特别是秋收起义受到镇压以后,湘鄂西革命运动由公开转为秘密,经过民主革命锻炼的贫农,对土地革命的要求十分强烈。中共中央派遣贺龙和周逸群前往湘鄂西发动群众,建立工农革命军,开展武装斗争。1928年初,贺龙、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,随后发动桑植起义,创建红军第四军,至1929年初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与此同时,鄂西地区的斗争也得到发展,并创建了红军第六军。1930年7月,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,成立红二军团。至此,包括湘鄂西、鄂西、襄樊、巴兴归等地在内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成,有力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。贺龙在文中详细记述了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辛过程,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。



《洪湖黎明》(油画) 恽振芳作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作品。

来源:军博网站

因为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取得了某些配合,在短期内便消灭了长江两岸的许多股团防和土匪,缴获了不少武器,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,队伍也发展到近千人。

这次行动是巡回式的游击行动,虽然取得了胜利,改善了工作局面,但是,当时只知道打富济贫,却没有充分发动农民,更没有开辟一个中心区域作为立足之地;加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,过早地进攻监利县城,致使胜利没有能够巩固。

监利虽然没有攻克,可是伤亡不大,部队力量还是保持下来了。根据当时国民党内部分裂日益尖锐,吴佩孚、孙传芳等部被打垮后,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正酝酿新战争,长江两岸的反动武装并不雄厚等情况,可以说客观环境还是有利的。如果当时能把这支部队好好整顿,依靠党的工作力量,深入发动群众,形势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但由于当时前委的农村根据地思想和政权观念还很模糊,结果就让邓、彭部回洪湖附近,吴部回石首;贺锦斋把部队交石首中心县委,随我和周逸群同志到湘鄂西组织军队。由于失去领导中心,分兵后吴部完全分散,邓、彭部只留下少数人。贺锦斋部在后来石首中心县委被破坏时也大部垮台。然而革命斗争的火种却撒遍了大江南北,不久以后,在周逸群等同志领导下,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,又如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,并顺利地建立了红六军。

前委所以选择在湘鄂西发展武装,创立苏区,一方面,因为那里的反动统治较其他地区薄弱;另一方面,因为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,有旧的关系。当时认为只要利用这一关系就可以抓到军队。此外,地理条件也很有利,进可以东出湘鄂中部,西入四川,南下贵州;退可以据以固守,生息发展。

一九二八年三月,湘鄂西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四千人。同时进占了桑植城,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。这支武装的来源是:一、利用亲族封建关系召集的一千余人;二、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。当然,这些部队的基础仍旧是旧的,需要在斗争中逐步改造。

四月,国民党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,突然派四十三军一个旅向桑植城和洪家关进攻。由于刚召集的武装没有整编,更未得到改造,战斗力不强,洪家关与苦竹坪两次战斗均未能把敌人击退,部队本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。接着,周逸群同志回到沙市,领导鄂西特委,组织长江两岸的革命斗争。

这次挫折,使我们后来体会到:用旧的封建关系建立的革命武装,不经过彻底改造是经不起风险的。革命的武装斗争,首先要建立在发动群众(在当地来说就是发动农民)的基础之上,依靠群众建立的革命武装,才是巩固的。旧军队可以利用,但是在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方面以后,一方面要发挥他们有军事知识的长处,同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,加强思想改造,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经过斗争的劳动人民在其中起骨干作用,以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,使之能够自觉地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。可惜的是,当时对这些问题我们都还不懂,只是经过屡次挫折,才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道理。

此后,又经过两次战斗,我军转至桑植、鹤峰边境活动。这期间反动军队的压迫虽然较小,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非常复杂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,或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混同起来,以及受地主、富农家庭影响甚深的人,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阻力。前委有鉴于此,决意向这些有害倾向作斗争:首先进行改编,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。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,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;加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,在士兵中吸收党员,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;对于坚持错误、违反党的政策的分子,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。经过这样整顿,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,迈开了革命化的第一步。

这时,我们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,虽有一些认识,但是缺乏周密而完整的措施和积极行动。加上政治干部异常缺乏,地方党又无基础,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工作还没有超出宣传阶段,因而在短时间内,自然不可能发动贫农作为农会核心力量,以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,并巩固农村根据地。

在湘鄂西有些封建武装,是我大革命以前的部属,因此我们就利用这种旧关系与之谈判,求得暂时的安定,以便整顿部队和待机打击国民党军队。七月,接湘西特委转来湖南省委通告,要我军东进,牵制敌对湘东红军的进攻。

八月二十五日,我军进驻石门西北乡之中心区域磨市,后来又转到澧县王家厂堰一带游击。镇压了一批土劣和清乡委员,领导农民打土豪、烧契约,号召农民分配土地。湖南军阀组织上万兵力分三路向我进攻。九月七日,工农革命军转向石门仙阳。翌日拂晓,我左翼奔袭我红军部。部队经所街退至泥沙,又遭敌人攻击。是役,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先后壮烈牺牲。接着部队就移往鹤峰。

这次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一、石门惨案后,石门北乡党和群众基础受到沉重打击,红军作战没有群众配合;二、进展过快,如果先在有群众基础的泥沙开辟工作,而后逐步东下,就不致因孤军深入而招致挫折;三、湘西红军力量单薄,不能与强敌周旋,加之石门南乡、桃源东乡、常德北乡、临澧等处的斗争均遭失败,使敌人得以集中力量进攻湘西红军。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,部队攻入建始城,缴获民团枪百余支,同时招收了一批劳动人民参加了队伍。后来又收编了农民武装陈宗瑜部二百人。接着又打开鹤峰城,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,派人四处发动群众,分配土地,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。一九二九年五月,桑植城解放后,我们就有了两个县城和县的政权。此外,还在龙山、宣恩、五峰、长阳、石门边境,展开了工作,建立了县、区政权。这是湘鄂西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。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,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,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,才开始懂得一些,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。

至于部队面貌,也有相当改变。新的建军路线——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执行。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,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,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。建立了政治机关,在和鄂西红六军会师以前,又坚决进行了几次“内部转变”。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。

七月,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植。我军诱敌由南渡渡口过河后,即开始攻击,迫其背水作战,将其大部歼灭,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。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,复亲率部两千余人并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犯。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,大开四门,诱其深入。当敌人入城后,伏兵齐出,将敌人大部歼灭。向子云率少数人马向后退。他们到达赤溪河边,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。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,泗至中流,即被洪

水吞没。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外,其余或被水溺毙,或在岸边投降。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,缴得长短枪千余支。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装,向大庸、永顺、慈利一带游击,并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。

“神兵”虽然都是迷信团体,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,为了反对军阀、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。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,一般地还不欺压群众。因此我们就设法与之联络。对其领导人,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,对下层则加紧团结、教育。结果争取到两三百新兵。但对于为非作歹的,则坚决给予打击。此时,部队已由九十一个人、七十二支枪,发展到三百多人、一百多支枪。又编了两个大队。

但是在长期与党隔离的情况下,也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到失去党的领导的沉闷和痛苦。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搞红军,不是搞白军。但是红军怎么搞,根据地怎么建设,由于我们当时还处在幼稚阶段,对这些问题理解得不深、不全。于是决心派专人到长沙、宜昌和常德寻找湖南省委、鄂西特委和湘西特委。终于在一九二九年年初,与三处党组织都取得了联系。周逸群同志不断写信通报鄂西的情况,并且陆续派来不少干部,加强了党的工作,提高了红军政治素质。同时党中央也发来不少重要指示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。于是红四军的行动纲领也明确起来,逐渐摆脱开不利的处境,一步步发展壮大。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,部队攻入建始城,缴获民团枪百余支,同时招收了一批劳动人民参加了队伍。后来又收编了农民武装陈宗瑜部二百人。接着又打开鹤峰城,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,派人四处发动群众,分配土地,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。一九二九年五月,桑植城解放后,我们就有了两个县城和县的政权。此外,还在龙山、宣恩、五峰、长阳、石门边境,展开了工作,建立了县、区政权。这是湘鄂西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。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,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,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,才开始懂得一些,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。

至于部队面貌,也有相当改变。新的建军路线——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执行。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,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,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。建立了政治机关,在和鄂西红六军会师以前,又坚决进行了几次“内部转变”。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。

七月,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植。我军诱敌由南渡渡口过河后,即开始攻击,迫其背水作战,将其大部歼灭,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。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,复亲率部两千余人并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犯。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,大开四门,诱其深入。当敌人入城后,伏兵齐出,将敌人大部歼灭。向子云率少数人马向后退。他们到达赤溪河边,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。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,泗至中流,即被洪

水吞没。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外,其余或被水溺毙,或在岸边投降。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,缴得长短枪千余支。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装,向大庸、永顺、慈利一带游击,并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。

赤溪河大捷,引起了湖南统治阶级的惊慌。八月,反动派吴尚和陈渠珍等部共两万余人,进攻湘鄂西。鉴于敌强我弱,红四军乃主动撤出桑植城,转至鹤峰、五峰、长阳、松滋等地,发动群众,开辟新区工作,以期与鄂西连成一片。

一九三〇年三月,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决议,东下与红六军会师。留部分主力为骨干和一部分游击队,坚持湘鄂西的斗争。但是由于红六军个别领导同志,对亟须统一集中湘鄂西革命力量的客观形势缺乏正确认识,没有及时策应,所以红四军三次东进,均被敌人阻截。后来由于周逸群同志坚持特委决议,红六军才挺进江南。七月初,两军会师于公安城。

红六军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鄂西特委直接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。一九二八年初,周逸群同志由鹤峰回沙市后,即领导鄂西特委工作。

周逸群同志在沙市、宜昌工作期间,一方面领导城市工人运动,同时也领导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。沙市遭到破坏,他由城市转到农村以后,才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。

一九三〇年一月,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,组成了红六军。它的来源是:以洪湖的柳家集为中心的段德昌、彭国才所领导的游击大队和以白露湖的沙岗为中心的段玉林、彭子玉所领导的游击大队。段德昌、段玉林、彭国才、彭子玉等同志,多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。大革命失败后,他们被派回农村与地方党取得联系,发展红色游击队。经过几次艰苦的起伏的斗争,终于建立起小块根据地。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,加上党的组织力量较强,群众条件较好,国内形势有利,特别是鄂西特委及时采取了把各县游击队集中领导、统一指挥的有效措施,更促进了鄂西游击战争的开展。一九二九年底,段德昌、段玉林部队已扩大到数百人,许多份的红色游击队也成长起来。他们在监利县汪家桥会师,宣布成立红六军,负责人是周逸群、孙德清、段德昌、段玉林、许光达等同志。

红六军成立后不久,即采取逐步推进方针,先后攻占了沔阳、潜江、石首、汉川等城镇,后来又渡江南下,打下了华容、公安等地,创立了长江南北两岸两块根据地,部队也获得极大发展,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区的巩固基础。

这期间,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,开辟了赣南、闽西根据地,一九三〇年六月,组成了红一军团。其他红色区域,凡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,革命事业均有发展。这时,党的威信提高了,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,从而大大地动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根基。

在这种形势下,红四军与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。红四军改称红二军。渡江东进后,解放了许多城镇,扩大了武装割据,红二军团发展到两万人。红二军团的成立,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

一个新的阶段。它和鄂豫皖、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,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。这是党的、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,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。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,是以周逸群同志为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、坚韧努力的结果。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,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。这是一条红线。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,是和原有的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。

关键问题在于路线正确与否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,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。但是一九三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秋天之间,湘鄂西遭受了两次严重挫败。这两次挫败是在第二、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直接影响之下造成的。一九三〇年秋,第二次“左”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,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,配合进攻长沙。结果使红军在半途遭受挫折,湘鄂西根据地也由于失掉红军的支持,损失很大。

更严重的挫败发生在一九三二年春天至一九三四年秋天。湘鄂西分局贯彻了第三次“左”倾路线,结果把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。直到红二、六军团会师以前才有转变,遵义会议决议传来以后,根据地和红军才又恢复、发展起来。

回顾湘鄂西的斗争,我们深深体会到,在实际工作中,凡是实行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,就一定胜利;反之,必遭失败。湘鄂西初期虽然因经验不足而受过挫折,但终于建立起大块根据地,发展了武装,发动了群众,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,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。这些,说明了那时湘鄂西的党的革命实践,基本上是正确的,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;虽然在某些方面没有上升为理论,不是自觉的。而后来的错误路线,却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。回忆往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,不能不令人深刻地认识到: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,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

贺龙 出生于1896年,湖南桑植人。文中身份为红四军军长,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,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。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,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,中央军委委员,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,国防委员会副主任。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。1969年逝世。



长征

第 4750 期